

高校政治类专业课程思政中的价值塑造与教学模型创新

杨 达,沈青青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东盟研究院 /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目的在于将价值观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提升课程教学的效果。当前,高校政治类专业旨在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输送心怀“国之大者”的优秀政治人才,但这一目标定位与实际培养环节存在多重张力,具体表现为内容相对迟滞而与现实错位、内容庞杂阻碍价值融通、价值塑造缺位而使立德树人受阻,导致培养过程中出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观其深层动因,则反映出政治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存在一定的价值规定模糊对学生行动伦理塑造上的不足。本文以“国际战略学”课程思政创新为例,总结出一种“混联式”教学模型,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浸润于课堂教学中,以期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课程思政;以人民为中心;混联式教学模型;国际战略学;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5X(2026)02-0085-14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创造,在名称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价值教育或品格教育,但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功能具有同质性。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指出,美国的公民教育实为传授“政治社会化”技术,而中国则称之为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1]。为此,有必要批判性地透视外部经验,从思想理念、制度设计、实践方法等多层面汲取有益资源^[2],以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有效避免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任志峰^[3]指出,美国虽无“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通过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及品格教育三种形态履行相似职能。顾洪英^[4]指出,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的思想教育在目标上强调政治功能的实现,在内容上注重实用性与时代性,在方法上追求科学化与艺术化,并高度重视社会实践的育人作用,在坚持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同

收稿日期:2025-0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国际战略学”(本-2021-0266);贵州大学AI课程建设项目“AI赋能‘国际战略学’课程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研究”(XJG2024104);贵州大学高水平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国家急需区域国别领域人才培养的‘战略思维4S牵引’模式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杨达,男,侗族,贵州黔东南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贵州大学国家“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研究员,主要从事绿色治理、国际战略研究;沈青青,女,贵州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绿色治理、国际战略研究。

时,也注重结合学生实际融入特定文化价值内容。刘炳赫等^[5]指出,在大正与昭和时期的日本教育中,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由此引发了忽视劳动教育、考试竞争恶化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小原国芳提出了以“真、善、美、圣、健、富”为核心的“全人教育”。日本高校以此为依托,通过组织种植、清扫等实践活动,推动学生在身体力行中内化尊重劳动、珍惜成果的价值观念。1995年,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在《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所有学科均应在不丧失其专业特性的前提下,为政治教育作出独特贡献。为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与课程思政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对上文提及的国外相关教育理念与具体实践进行深入审视,以规避其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可能带来的同质性竞争风险。总的来看,可从下述四方面进行系统思考:一是着眼不同学科的知识架构与思维模式特征,推动思政要素融入专业教学;二是弘扬实践育人精神、丰富校内外实践平台,为学生在身体力行中深化认知创设有利条件;三是立足教学实效性与吸引力,有针对性地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四是在价值观教育中着力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现实议题等核心要素,以彰显文化主体性与时代性。需要强调的是,在批判性透视国外实践的过程中,还应同步把握两个要点。一方面,必须明确价值立场,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另一方面,必须保持理论警醒,深刻辨析西方教育理论背后隐含的特定价值取向。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理论自信、学科自觉与价值辨析中走出自主发展之路。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存在的“两张皮”问题。对此,不同专业需要根据其独特性和发展方向深入探究专业育人目标和课程思政内涵。那么,到底如何在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真正耦合?就此,高校政治学专业课程教学便成为透视课程思政痛点和解决之道的较典型途径,而这也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政治学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导引都关注政治领域。理论上,政治学专业承载的课程思政应当具备知识资源上的内在优势。但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政治学类课程的很多专业理论源自西方^[6],若将其“非因地制宜地”运用于透视中国政治实践,便会产生进一步影响政治学类专业的课程思政成效的张力。

对此,本文以政治学类专业的“国际战略学”课程为案例,思考如何解决政治学类课程的专业知识传授与课程思政传导的“两张皮”问题,这在学生更易获取基础知识的人工智能时代尤为重要^[7]。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与社会各领域加速数字化转型,高校思政课改革也亟须顺应这一趋势,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与重构^[8]。具体而言,授课教师结合“国际战略学”课程的国际比较视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一种“混联式”的教学模型融入专业课程教授,引导学生在理论学习和案例情景中不断换位思考、比较分析,在实现专业知识传授目标的同时,也更有效地达成引导学生成长为“国之大者”的专业素养培育目标。

一、课程思政建设方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高站位引领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巧妙融入和深度展示,既是政治学类课程“国之大者”专业素养培育的必要职责,也是成功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所在。作为西方教育理论界两大巨头,赫尔巴特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对全世界教育领域的专业发展及学科建设都有很大影响^[9],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单纯运用赫尔巴特所主张的“课堂中心”

“教材中心”和“教师中心”的“旧三中心论”，或者杜威提出的“学生中心”“活动中心”和“经验中心”的“新三中心论”^[10]，都不足以完全满足需求。究其根本，赫尔巴特的主张忽略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实际情况，无法契合课程思政目标已经由单纯获取知识到学以致用现实；杜威的理念则削弱了教师的引导作用，难以适用于具有高度抽象和理论性特点的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因此，系统运用上述两种教学理论，明确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地位，以及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双教学目标，才能更好实现“1+1>2”的“化学反应”。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引领下，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目标转变为培养既具备专业能力又能洞悉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国之大者”，这就要求教学内容和方法不仅应符合专业知识标准，还需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和价值取向，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知识视角和责任感。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过程应包含教师引导教学、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三个方面，这体现了教与学的互动关系^[11]。因此，在政治学类课程的专业素养培育环节中，应当遵循现代教学观的内在逻辑，采用师生积极相互作用的教学模式，以取代传统的“填鸭式”教学。

（一）“以人民为中心”教学的必要性

在课程思政作为思政建设重要组成的前提下，为有效回应思政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贯彻落实高校思政建设工作要求，政治学类专业应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上转变为培育具备专业知识与能力、心怀家国与人民的“国之大者”，而该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的重要引领与深度渗透。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取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之精华并去其封建政治思想糟粕的产物^[12]。从内容承载上看，不仅剔除了“官本位”的特权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等级秩序、发扬以民为本的优秀政治伦理传统，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追求，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的鲜明宣示。同时，“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立场、观点、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而其在教育领域的扩展则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这不仅体现了对学生实施全面教育的理念，也明确了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身份，还回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新时代教育三问。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对引领思政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其引入教学可实现多方效应：一则有助于思政教育范围的扩大、内容的丰富，进而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二则有助于推动实施多元化思政教学，因材施教、模式创新，快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三则有助于思政教育的良性发展与价值实现，使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从孤立、割裂的独立体转变为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教学共同体。

此外，“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融入关乎国家新兴力量培育的高校专业教育，显然是一种回归中国本土优秀政治思想的教学实践范式。该理念的浸润使得“人民”这一贯穿中国社会始终的主体成为教学的逻辑起点与终点：一方面，为人民教学，即以“人民”在教育领域的具象化体现—学生，作为教学主体。另一方面，教学为人民，即把专业教学目标，尤其是素养目标的设置与“人民”挂钩，使得学生不仅要学有所成，还要学有所用、用于人民，以助力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在课程思政建设全面铺开的国家战略格局下，“以人民为中心”教学成为高校培养国家建设后继者的时代需要与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13]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规划了具体路径。这与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要求相契合，还与政治学专业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的目标相一致。同时，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三进”工作的生动范例。

(二)专业素养培育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适应新形势、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任务的迫切要求，“好的国家治理”由此成为国家得以存续、兴盛的关键，其核心支撑则在于培育具备家国情怀的“好的政治人才”^[14]。此类人才需立足中国国情、直面本土政治现实、深入了解中国政治实践、精准识别、挖掘并解决真实问题，尤其需善用专业理论知识服务于国家顶层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不可仅停留于简单的理论移植^[15]。

政治学专业课程教学在此类人才培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核心任务聚焦于系统培育一代代青年学子“好的政治”专业素养，这本质上是知识传授、能力塑造与价值引领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这一专业素养的内涵在于培养学生构建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与跨学科知识体系，训练其敏锐的政治现象洞察力与解决复杂治理难题的实践能力，并引导其深刻理解、坚守民主、法治、公正等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在认知层面，系统性地构建了理性、科学的政治思维方式，奠定认识政治世界的方法论基础；在实践层面，显著提升了应对复杂治理挑战的实践效能，实现知识向行动力的转化；在价值层面，深刻塑造了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规范的价值认同体系，并驱动政治知识的本土化创新转化。落实到具体实践，“好的政治”不仅能助力学生形成认知与分析现有国情的大局观，使其在走上不同领域工作岗位后，通过多渠道延展，推动有效国家治理的生成与落实；还可以在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现实下，使有效国家治理成为对外顺畅推进国际战略的内部支撑和关键。同时，“好的政治”所培育的符合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秀人才，也更是能服务国内治理提升和支撑国家对外战略实践的重任肩负型“国之大大者”。尤为关键的是，“好的政治”专业素养培育的价值导向与思维品质维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高度契合、内在统一。思政教育所强调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与法治精神，为“好的政治”专业素养的价值内核提供了坚实支撑；而“好的政治”专业素养所要求的批判性思维、政治实践能力与治理智慧，则为思政教育倡导的价值理念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因此，培养具备此种高度整合性政治专业素养的人才，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政治学教育的根本要求，也是政治学学科回应时代命题、履行学科使命的关键路径。也唯有深入挖掘政治学专业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并推动专业教育和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合，才能培育能切实思人民之所思、谋人民之所求的“国之大大者”。

因此，为契合好的国家治理的内在需求，形塑有关“好的政治”的培育过程，政治学专业课程教学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与思政教育在教学要义上同向并行，将培育心怀“国之大大者”的优秀政治人才设置为优先级教学目标。

(三)“以人民为中心”对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的价值引领

现阶段的人才培育与国家治理及民族复兴联系紧密,在此前提下,政治学类专业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高站位引领,推动深入贯彻落实高校思政建设工作要求,与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齐头并进,旨在培养心怀“国之大者”的政治人才。然而,在外部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的存在却使得专业教育的价值引领层面存在真空,进而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

受“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权以及中国社会消极历史文化传统残余的冲击,中国的政治学类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瓶颈。具体来看,前者包括西方所蓄意主张的“国家—社会关系二元对立观”等。这些内容在西方市场盛行,但与中国实际严重不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伦理极度断裂。当前学生知识获取渠道的多元化,迫切要求教学以客观、严肃的态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形成基于中国实际的积极认知,以规避西方错误思潮对中国道路、制度的误读。此“三观”体系涵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世界观、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奋斗人生观,以及统合国家、社会、公民三位一体责任与权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者在逻辑上呈现递进关系:世界观提供认知基础,人生观确立实践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作为最终落脚点—在公民层面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范个体行为,在社会层面与国家层面分别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内在要求共同指向保障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从而完成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逻辑闭环。这一闭环正是对抗教学中“官本位”等落后消极观念侵蚀的关键。后者易导致部分学生将政治学狭隘地解读为“谋官之术”,扭曲其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阻碍正确政治态度、立场与追求的形成。因此,强化“三观”教育,尤其是明确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对匡正学习动机、抵御认知偏差具有根本意义。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有机扬弃的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政治现实具有较高的适配度,这意味着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均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将其有机浸润于政治学类专业素养培育,不仅可以从根本上回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还能帮助学生识别和分析不同政治学说中的价值偏见和历史背景,培育学生具备意识形态警觉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凸显的人民本位,既有利于培育胸怀“国之大者”、同时能立足中国国情进行政治实践的智慧产出型政治人才,又有利于人才牢牢树立人民中心意识以确保其政治行为始终利党利民。

因此,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通过深刻领悟其政治伦理内涵,进而识别其与西式理念、传统消极历史文化的差异,可以将单纯的思政教育课堂拓展到专业课程教育教学过程。由此可以有效解决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最终实现培育“国之大者”的教学目标。

二、政治学类专业面临“课程思政”建设困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政治学类专业为贯彻落实高校思政工作要求,设立了培育“国之大者”的教学目标,其中尤为重要的价值引领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但政治学类专业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三大问题催生了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专业教学原初目标的实现,还成为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困境的

症结。其一,政治学类课程主体理论知识多基于以往历史而形成,但在政治社会现实常变常新的当下,政治学经典理论已迟滞于现实,于是契合于现实的思政教育便难以有效融入涉及经典理论的专业教学。此外,教学内容的迟滞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难度,这迫使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进行不利于思政教育目标实现的取舍,即将更多时间成本投入到教学基本目标的实现上。其二,政治学类课程主体理论知识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这使得教学核心内容时常处于失焦状态,专业教学的难度由此增加。也正因此,教师难以兼顾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导致思政教育要素的挖掘与思政教育理念的融合不到位。而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多学科融合趋势又进一步丰富了本就“富足”的教学内容。其三,政治学类专业教学中,存在价值塑造上的待强化方位,这不仅使立德树人的目标难以依托专业教学而实现,还使得二者间的壁垒日益深厚,以致二者融合难度持续扩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正是在上述三大问题的合力作用下,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便应运而生,并被持续加剧。

(一)教学内容滞后,难以契合现实

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在于教学内容的理论滞后性—现有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现实。这一理论滞后不仅阻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使二者呈现“两张皮”状态,还削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进而加大教师教学压力,致使教学过度侧重知识传授而忽视思政教育,最终进一步加剧“两张皮”问题。

着眼日新月异的客观世界,源于西方且有较大影响的诸多政治学理论已无法或难以较好地用以解释全球化趋势下日渐复杂多元的政治现实。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6]。然而,2014年福山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深入剖析美国政治诸多弊病,并指出美国政治现实的僵局已然处于无解之境,其民主制度的政治衰败仍会持续。同时还表明,在写下历史终结论时,从未想到西方政治竟会出现倒退。但如今日渐极端化与分裂化的美国政坛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削弱却已成为现实。因此,若现在仍然从历史终结论的角度出发,无论是用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非“自由民主制度”国家的良好发展态势,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已然走向崩坏的政治现实,显然都不合时宜,且无法逻辑自洽。政治局势与社会现实常处变动之中,而作为教学主体内容的政治学理论与思想却多基于既定的历史而形成,随着社会的更新迭代,后者对现实的解释力度大幅减弱,二者间鸿沟愈发加剧,适配度也大大降低。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投射于“国际战略学”课程教学中,则呈现为双重问题:其一,教师难以将“数字地缘政治”“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滞后的理论框架(如传统安全观因其国家中心主义与军事导向,难以有效解释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跨国性与综合性特征),催生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两张皮”现象;其二,理论解释力的不足显著增加了学生理解课程核心概念(如权力转移、战略威慑等)的难度,迫使教师过度聚焦知识传授本身,弱化了在专业教学中渗透战略思维与国家立场等价值引领目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张皮”问题。

因此,为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正确认识自身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成为心怀乾坤、胸有丘壑的“国之大者”^[17],要将思政教育与政治学类专业的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有效解决专

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应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并将其作为教学焦点来对教学内容进行重塑。通过凸显其本土性与时代性,使专业教学与社会现实尤其是中国社会现实产生内在关联,以破除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间的壁垒,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二) 教学内容庞杂,阻碍价值融通

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另一显著困境在于教学内容庞杂陈旧引发的体系性缺失。一方面,内容“富足”而核心失焦,迫使教师优先完成知识覆盖,挤压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空间,直接催生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另一方面,新文科建设要求的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前沿更新,在此庞杂陈旧的内容基础上强行叠加,非但无法实现体系优化与有效融合,反而加剧内容混乱与核心迷失,致使“两张皮”问题在更新压力下进一步恶化。

政治学类专业课程体系庞杂,涵盖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制度、治理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这种内容“富足”却缺乏核心聚焦的课程设置,不仅导致教师难以进行有效的层次与逻辑梳理,阻碍了课程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与有机融入,还加剧了专业教学任务难度,迫使教师重心向知识传授倾斜,无力兼顾价值引领。由此,思政教育难以依托专业知识有效展开,“两张皮”问题的部分根源便在于这一结构性内容的失序。落实到具体教学中,“国际战略学”课程内容体系的庞杂性与滞后性,直接制约教学效能并阻碍思政融合。教师难以在涵盖传统地缘博弈、新兴技术冲击及非传统安全等快速演变的多元议题中,精准锚定如权力转移本质或战略威慑当代形态等核心概念,并据此设计层次化教学。而这又可能进一步导致教学深度失当:或囿于陈旧框架而晦涩难懂—过度依赖传统均势理论阐释数字空间博弈;或陷于现象罗列而流于浅表—仅罗列全球挑战却缺乏深度战略分析。此类教学失序使得课程内容难以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思政要素有效联动、引发共鸣。同时,庞杂内容挤压了学生通过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方式深度参与的机会,抑制其学习主动性,导致知识吸收表层化。对此,教师重心被迫持续偏向知识覆盖的广度,进一步侵蚀了思政融入与价值引领的空间。于是,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学中心环节的任务就无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也难以有效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18]。

政治学类专业本身具有在教学内容上与思想政治存在重合的先天优势。为有效运用该优势,克服教学内容庞杂陈旧的结构困境导致的“两张皮”问题,关键在于以“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支点,重塑教学核心。一方面,需聚焦中国政治内在思想脉络,尤其突出“以人民为中心”这一要旨;另一方面,可借助数字技术,在既有知识体系中精准定位、厘清脉络,系统挖掘并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实现专业内容与思政目标的结构整合。如此,就能更好地运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使政治学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以拓展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新格局^[19]。

(三) 价值塑造缺位,立德树人受阻

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又一深层困境表现为价值塑造缺位,其根源在于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下核心概念与理论的创新不足或阐释乏力。价值引领本身就构成“两张皮”问题,并同步削弱了抵御非主流文化渗透的能力。在“教”方面表现为教师因理论阐释不足,未能充分识别落后文化威胁并凸显正向价值内涵。在“学”方面则表现为学生因理论支撑薄弱,难

以自觉辨识、抵御落后文化侵蚀。于是价值塑造无法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会贯通,思政教育也无法与专业教学实现全面协同,“两张皮”格局由此被固化。

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决定了即使社会制度变革,某些深层文化基因,如根植于人们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官本位”文化—仍难以彻底中断。其作为一种未直接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隐性文化因素,既未遭遇强烈抵制,不为人们所明显抗拒,亦非新制度涤荡的优先目标,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存续。最关键的是,在独特的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官本位文化持续弥散,深刻影响着社会价值塑造。从社会文化来看,中国独特的人情社会使得民众在处理事务时优先考量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而构建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官本位文化恰能对此类关系运作提供便利^[20]。从权力结构来看,中国金字塔形权力结构下,权力相对集中,运行方式主要呈现自上而下的特征。这种纵向的权力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催生对权力和层级的过分重视,而这两方面又恰是官本位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为其长期延续提供了一定的土壤^[21]。官本位文化不断向社会的弥散与强化,根本上反映了我们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下,对相关文化惰性及其价值塑造机制的概念提炼、理论阐释与创新发展存在显著不足。这种理论缺位使得针对官本位等隐性文化因素的价值塑造难以有效展开。这体现在“国际战略学”课程教学中,在“教”的环节,部分教师对专业教学承载价值塑造功能的理论认识深度不足,导致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先进理论深度融入国际战略分析的主动性与方法论创新受限,而在“学”的环节,学生对多元意识形态的警觉性与批判性不足,反映出理论阐述并未实质性转化为抵御落后文化的有效工具。上述环节的薄弱直接影响教学成效,致使未能引导学生形成契合新时代内在要求的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也由此被片面狭隘地解读为“搞政治,学做官”路径或权力博弈技巧传授,这凸显出“两张皮”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尚未构建起足以支撑有效价值塑造的、具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框架与理论范式。

弥合价值塑造在专业教学中的缺位的根本路径在于克服自主知识体系内相关概念与理论的创新及阐释不足。鉴于价值塑造是立德树人的第一要务,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其缺位将使专业教育丧失灵魂。政治学类课程教学必须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对教师而言,应以其为教学焦点重构教学内容与方法,使其贯彻落实到教学各环节,并厘清教学目标中价值引领相对于知识传授的优先性;对学生而言,重点在于以此为基准,提升对多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判断力。如此,既回应了培育“国之大者”的教学目标,更通过强化价值引领在专业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对“两张皮”困境形成实质性应对。

三、基于“混联式”教学模型创新的破局尝试

透视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的三大困境,其根本在于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立足现实国情而提出的,对中国本土政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对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均可形成重要引领,是破解困境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两张皮”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价值引领与深度浸润。本文借助政治学类的典型课程“国际战略学”,并基于混联式教学模型创新来进行破局尝试,以探索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困境的破解之道,混联式教学模型如图1所示,模型中具体教学流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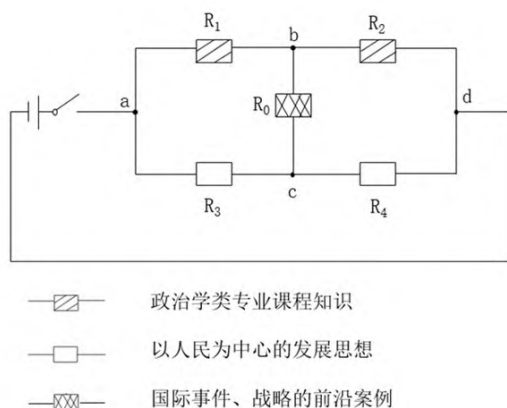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学类专业混联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型

由图1可知,其中R表示亟待学生学习的知识; R_1 、 R_2 代表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 R_3 、 R_4 代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R_0 代表国际事件与战略的前沿案例,I的走向表示学生认知。a、b、c、d代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同状态:a代表学生开始学习前的初始状态,b代表学生仅学习了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后的状态,c代表学生仅学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后的状态,d代表学生完成全部学习后的最终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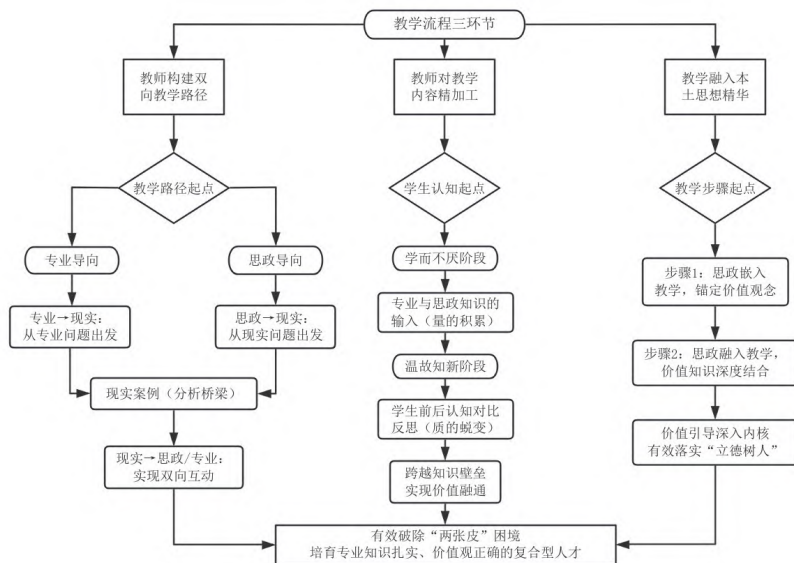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学类专业混联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型的具体教学流程

(一)“以人民为中心”历久弥新,有效弥合时滞错位

在政治学类课程既有理论体系难以匹配日新月异的政治现实而解释力度逐渐降低的前提下,立足于现实的思政教育难以有效融入主体理论知识迟滞于现实的专业教育。于是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两张皮”问题应运而生,并构成了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困境。对此,为有效解决“两张皮”问题,关键在于借助“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历久弥新的特性,破除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间的深厚壁垒。一方面,可运用“国际战略学”中的国际战略元素,

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思政元素,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类课程中的教学元素组合,提高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与政治现实间的契合度。另一方面,可围绕能有效联动专业教育、现实教育、思政教育的支点,重构教学内容与教学路径,即遵循混联式教学模型设置进行教学,以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进而推进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困境的解决。

该模型内的R设置中, R_0 ,即国际事件、战略前沿案例代表可联结专业教育与现实、思政教育与现实的支点。I的电流走向表示学生认知过程,其中 $a \rightarrow d$ 电流走向为第一阶段,即学生认知的“学而不厌”阶段,弥合错位可通过该模型内 $a \rightarrow d$ 电流走向中与 R_0 存在重叠的两种情况实现:一是形成“专业教育—现实—思政教育”教学路径。 $\textcircled{1} a \rightarrow R_1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表示学生先以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宏观视角对国际事件、战略的前沿案例进行深入认知后再融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学习。即先从专业知识出发,再从思政知识角度对同一事件或案例进行思考。二是形成“思政教育—现实—专业教育”教学路径。 $\textcircled{2}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2 \rightarrow d$,表示学生先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微观视角对国际事件、战略进行深入认知后再融入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的学习。即先从思政知识角度,再从专业知识角度对同一事件或案例进行思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新”思政的重要内容,既体现了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深刻内涵,又体现了历久弥新的以人为本理念,将其通过与专业教学内容元素组合的方式浸润于教学,不仅能增强思政教育与现实间的关联,还可有效弥合专业教学内容与现实的错位,进而推动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全面融合,破解“两张皮”问题。

呈现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国际战略学”课程中“大国战略”相关章节的教学为例,教师可选取中美贸易争端这一典型案例作为 R_0 。该案例能够有效联结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适合作为课程切入点展开教学。首先,教师可遵循“专业教育—现实—思政教育”的路径,从学生专业知识基础出发,激发其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运用国际战略理论解析案例实质,使学生认识到案例反映的是大国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博弈,其实质为霸权国(美国)与崛起国(中国)之间的多维竞争。同时,在具体分析中美贸易争端案例时,教师可引导学生从历史视角出发来探究国家行为的深层动因。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思想家曾指出,战争的根本原因往往不是制度差异,而是源自人性中难以节制的欲望。这一观念演进至国家层面,形成所谓国强必霸论,并在西方崛起过程中通过殖民扩张与霸权行径等方式得到历史印证^[22]。然而,西方历史经验与以此为基准而构建的理论框架并不具备普适性。尤其在科技飞速发展、国际格局深刻演进的今天,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清醒认识到,国家间关系已超越传统的零和博弈。美国将中国视作极可能影响其全球霸主地位的重大威胁,并对之采取一系列遏制措施,其本质是出于维持自身霸权,以及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扭曲性解读。这一现实则恰好反映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新的社会现实间的不适配。此外,教师还应当立足政治实践,通过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引导学生深刻辨析中美两国行为背后的政治逻辑,培养其形成立足中国现实的科学政治价值观。具体而言,教师可基于前述结论,指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源自其将中国视为自身体系挑战者的霸权思维,对华态度与政策具有明显进攻性^[23]。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合作优于对抗,但美国仍选择推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式制裁。这非但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反而可能会因巨大的资源损耗而削弱其为国内民众提供公共福利的能力。此种战略逻辑与中国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存在根本差异。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对比“一带一路”倡议所彰显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小院高墙”策略呈现出的排他

性取向,在帮助学生认清两种发展道路的实质的基础上,还能使其深刻领会中国理念所蕴含的道义高度,从而在比较中强化政治认同与理论自信。

在完成路径 $a \rightarrow R_1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的教学后,教师应按照“思政教育—现实—专业教育”的融合路径深化教学。教师应首先引导学生开展多角度思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其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使学生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对案例形成初步价值判断。同时,在运用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等对中美贸易争端进行剖析时,需要始终将以对我国人民福祉与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作为评判标准,以确保学术探讨的正确价值立场。路径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2 \rightarrow d$ 的设计则体现了思政教育的导向性原则与知行合一要求,既致力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注重培养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综上,学生不仅能够从理论层面把握中美贸易争端的动因与本质,还可深刻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对抗性思维的根本差异。这一过程既深化了学生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解,也推动了课程思政目标的切实落地,从而实现了专业教育、现实观照与思政育人三者的有机融合,有效破解了政治学类专业在课程思政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二) 内容设置化繁为简,寻找支点构建逻辑闭环

针对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富足”,核心内容失焦的问题,“混联式”教学模型对教学内容进行焦点定位、简化提炼与层次划分。该模型内 R 设置情况表示教学中“待学知识”的分布设置,共六类情况,具体如下:

R_1R_2 串联表示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间的串联;

R_3R_4 串联表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间的串联;

$R_1R_0R_4 / R_3R_0R_2$ 串联表示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国际事件与战略的前沿案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串联;

R_1R_2 与 R_3R_4 并联表示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联;

R_1R_0 的串联与 R_3 并联表示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与国际事件与战略的前沿案例的串联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联;

R_3R_0 的串联与 R_1 并联表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国际事件与战略的前沿案例的串联与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间的并联。

针对政治学类专业课程设置纷繁复杂的特性,混联式教学模型对教学脉络进行梳理、对学生学习认知路线进行规划。该模型内 I 的走向表示学生认知过程,共计两大阶段五种情况:

一是 $a \rightarrow d$ 电流走向为第一阶段,即学生认知的“学而不厌”阶段:

$a \rightarrow R_1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2 \rightarrow d$, 表示学生对于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的学习;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表示学生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学习;

$a \rightarrow R_1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表示学生先以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宏观视角对国际事件、战略的前沿案例进行深入认知后再融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学习;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2 \rightarrow d$, 表示学生先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微观视角对国际事件、战略的前沿案例进行深入认知后再融入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的学习。

二是 $d \rightarrow a$ 电流走向为第二阶段,即学生认知的“反思对比”阶段:

$d \rightarrow a$, 表示学生将“学而不厌”阶段的认知与初始认知进行对比思考。

该模型内的具体设置将看似并无关联的“政治学类专业课程知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国际事件、战略的前沿案例”这一支点而挂钩。在具体教学中,以“国际战略

学”课程中“国家安全战略”章节为例,教师可在课前引入AUKUS联盟与美澳核潜艇事件作为教学案例。该案例聚焦于国家安全、安全困境、核威慑等概念,与教学内容高度契合。具体来看:首先,教师可通过课前预习与案例导入等方式,引导学生初步理解课程中会呈现的国际关系理论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课堂中,则围绕教学案例引导学生分析机制的形成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在师生互动中逐步串联并整合起知识点。其次,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遵循 $a \rightarrow R_1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和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2 \rightarrow d$ 两条路径对案例进行剖析。如可以启发学生从核威慑效应的稳定性视角切入审视这一案例,帮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抽象理论,提升其政治分析能力。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不同视角的论证进行综合思考,培养其发散性战略思维。最后,引导学生对比课程初末的个人认知变化,尝试让其从中国立场系统评估AUKUS对印太安全格局的影响,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建议,推动学生思考如何将所学理论服务于国家顶层战略设计。通过构建这样的良性认知循环,既能强化学生专业素养,又能实现思政教育的内在融入,从而推动课程思政一体化,有效破解“两张皮”问题。

(三)融入本土思想精华,拓展价值塑造空间

高校肩负着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思想政治课程中,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必然要求^[24],其根本价值指引则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作为“以人为本”理念在新时代的政治升华,为破解政治类专业“课程思政”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根本的遵循与方向。消极历史文化传统残余阻碍了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全面融合,是“两张皮”困境的重要成因。对此,亟须将本土思想精华深度融入教学,以填补价值塑造空白。“混联式”教学模型为实现这一深度浸润提供了方法支撑,其关键则在于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构建新教学路径,即遵循“混联式”教学模型的设置来进行教学,从而有效转化官本位等落后文化的负面效应。

该模型内的R设置中, R_3 、 R_4 代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I电流回路走向表示学生认知过程,其中 $a \rightarrow d$ 电流回路走向为第一阶段,即学生认知的“学而不厌”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有效浸润则可通过该模型内 $a \rightarrow d$ 电流流动情况中与 R_3 、 R_4 存在重叠的2类设置中的三种情况实现: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嵌入教学,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表示学生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学习;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教学, $a \rightarrow R_1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表示学生先以政治类专业课程知识宏观视角对国际事件、战略的前沿案例进行深入认知后再融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学习;三是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2 \rightarrow d$,表示学生先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微观视角来对国际事件、战略的前沿案例进行深入认知后,再融入政治类专业课程知识的学习。

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可以以“国际战略学”课程中“国际战略的行为体与决策机制”相关章节的教学为例,选取“美国众议长麦卡锡卸任”这一国际政治事件作为核心案例 R_0 。首先,教师应按照路径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阐述,为后续的案例分析确立基本的价值立场。随后,可基于路径 $a \rightarrow R_1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4 \rightarrow d$ 引导学生对案例展开学理分析。具体来看,盖茨等人因麦卡锡与民主党达成“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的“背叛”行为而选择与民主党联手,共同罢免麦卡锡。这一行为反映出党内极端派为维护本派意识形态纯洁而不惜与他党联合的政客逻辑。同时,麦卡锡在任期间虽曾与民主党达成合作并成功推动法案通过,但民主党对于罢免动议却始终秉持支持态度。这表明民主党依旧以

本党利益为先,选择从共和党内部分歧中获利,其支持行为实质是为争取中间选民而介入共和党内斗,而非单纯服务于本党选民委托。从学理角度来看,该案例中的政党行为反映出“代表理论”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的张力。通过上述分析,教师可引导学生反思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决策逻辑与联盟脆弱性,从而培养其综合分析能力。在完成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维度重新审视该案例。如从麦卡锡的政治行为与其所应代表的选民利益来看,该案例暴露出党派立场与公众利益之间的何种张力?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选举民主间的差异与优势分别是什么?通过将政治学专业知识与人民主体性、发展正义性等价值立场相结合,有助于学生在具体情境中透过政治表象看清其价值实质,从而深化理论认识、建立价值自觉。最后,遵循教学路径 $a \rightarrow R_3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R_0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R_2 \rightarrow d$,先引导学生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出发,对案例中政治人物的行为进行微观审视,形成基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进而引入政治学专业知识,启发学生辨析中西方官员在行为逻辑上的根本差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应着重引导学生审视西方政治实践中党派与集团利益优先的行为导向,及其与“官本位”意识的潜在关联,并对照中国始终强调的人民主体性和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通过教学全流程的价值立场融入,不仅有助于推动思政引领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还能培养学生兼具理论洞察与价值认同的政治分析能力,从而树立起立足于中国语境的权力观与事业观。

四、结语

当前,政治学类专业将其教学目标设置与思政教育要旨紧密相连,强化“国之大者”人才培育。但基于教学内容迟滞于现实、庞杂而失焦、在价值塑造方面存在待提升空间等问题,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的难度与日俱增,课程思政困境由此而生。基于此,本文创新混联式教学模型,借助该模型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融入专业教学,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以此推动政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困境的解决。与此同时,该模型还具有较大的推广意义,即可随专业与课程的随机改变而对支点的选取与设置进行实时更新,以适应不同专业与课程特性,从而形成新一套“专业教育—现实—思政教育”联结逻辑,促使学生在专业知识高效汲取过程中深入把握思政教育核心要义,以此助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有效推进。此外,将模型运用于具体教学实践中时,可将大模型算法等数字技术运用于支点选取、教学内容聚焦、教学脉络重塑等环节。同时对学生不同阶段学习情况进行对比等可视化分析。由此节约教学成本、提升教学成效,并在此模型推广使用过程中推动现代教学的数字化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 [1] 吴锦旗. 当代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之维[J]. 学术论坛, 2005(11): 58-61.
- [2] 沈壮海.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自觉与新未来[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5, 1(1): 161-170.
- [3] 任志锋. 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之“名”[J]. 教学与研究, 2018(4): 89-94.
- [4] 顾洪英. 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8(2): 70-73.
- [5] 刘炳赫, 于伟. 小原国芳“全人教育”的价值界定与理论探讨[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10): 180-184.
- [6] 徐勇, 任路.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 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2): 165-182.
- [7] 杨达, 熊雪晖. 人工智能时代的广义绿色治理: 内涵演进、多重张力与范式构建[J]. 探索, 2023(2): 52-63.
- [8] 郭燕来, 傅伊彤.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的内在机理及实践进阶[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5, 37(4): 100-110.

- [9] 彭正梅. 大道泛兮赫尔巴特教育学思考的辩证特性及其与杜威的比较[J]. 全球教育展望, 2013, 42(7): 33-42.
- [10] 刘远碧, 廖其发. 赫尔巴特与杜威师生观的比较与启示[J].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6): 85-90.
- [10] 丁士松. 关于政治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53(6): 837-840.
- [12] 卢尚月.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中国哲学基础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 2019(3): 45-52.
- [13]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丁薛祥出席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并讲话[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4(6): 4.
- [14] 任瑞升, 黄维. 论人才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及实践路径[J]. 人文杂志, 2021(12): 8-15.
- [15] 陈周旺. “祛魅”与重构: 新政治学教学体系的知识化改革刍议[J]. 新视野, 2023(4): 38-45.
- [16] 佟德志. 人民的民主, 还是资本的统治: 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认识误区[J]. 政治学研究, 2013(6): 104-114.
- [17] 张莉. 青年习近平的故事对青年学子的启示[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18): 79-81.
- [18] 杨晓慧. 高等教育“三全育人”: 理论意蕴、现实难题与实践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18): 4-8.
- [19] 高德毅, 宗爱东. 课程思政: 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选择[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1): 31-34.
- [20] 罗来玮. 官本位意识的当代根源解读[J]. 领导科学, 2021(9): 15-18.
- [21] 刘杰. 级别弥散与官本位体制的成熟: 对唐宋官僚制级别管理的考察[J]. 学海, 2022(5): 42-52.
- [22] 许江. 中国道路: 跳出西方“国强必霸”逻辑的和平发展之路[J]. 红旗文稿, 2019(1): 18-20.
- [23] 赵明昊. 重新找回“西方”: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想初探[J]. 美国研究, 2020, 34(6): 45-64.
- [24] 彭廷廷, 吴孔军. 高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4, 36(5): 111-120.

Value Shaping and Teaching Model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ang Da, Shen Qingq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sean Research Institute/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ntent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 in an overall way is to integrate values into the knowledge delivery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t pres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 to provid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untry with outstanding political talents with a “greatness of the country” in mind. However, there are multiple tensions between this goal orientation and the actual cultivation process, which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ve delay of the content resulting in misalignment with reality,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tent impedes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s, and the lack of value shaping hinders forging moral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leading to the mismatch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The core motivation of this program reflects that the train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majors has certain ambiguities in the positioning of values and deficiencies in shaping the ethics of action for stude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s an example, and summarizes a mixed teaching model, which integrates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hopefully,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people-centered; mixed teaching model;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责任编辑:杨洪 张俊英]